



文化语义学

吴国华 杨喜昌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河南省“九五”社科项目

文化语义学

吴国华 杨喜昌 著

赠曾五永碧同志惠存，

杨喜昌 吴国华

00. 十二. 二十九.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语义学/吴国华, 杨喜昌著.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0. 9
ISBN 7-80150-096-2

I. 文… II. ①吴… ②杨… III. 语义学-研究 IV. 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933 号

书 名:《文化语义学》

著 者:吴国华 杨喜昌

出版发行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印刷者:北京谊文印装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8.4375

字 数:22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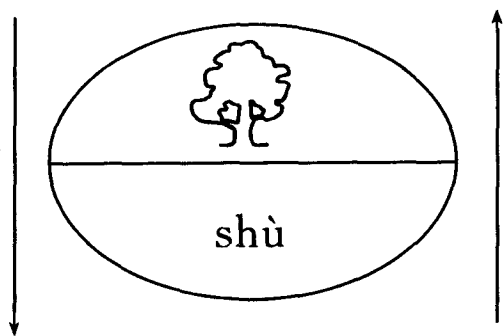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7-80150-096-2/G·17

定 价:18.00 元

序

吴国华、杨喜昌两位同志的新著问世,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可喜收获。本书材料充实,论说精当,有许多创新之处——读后自见分晓。我只就两个方面,试着对内容做点“注疏”工作。

自从索绪尔以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arbitraire)普遍被人们接受。照《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表示法是:



上面代表人们脑子中树的形象,下面 shù 是个音组形象。这两

2 文化语义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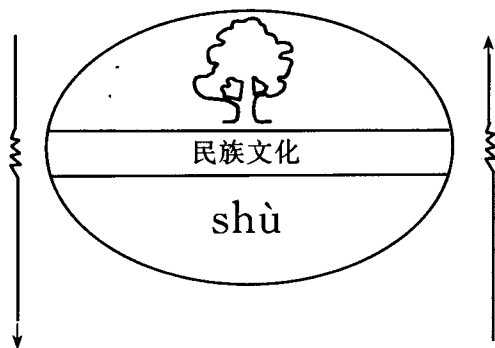
者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任何理据性。从抽象的符号学角度,当然没有错。任意性原则的确认,使符号(包括自然语言符号)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

问题在于:人类自然语言可以从抽象符号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而且需要)对具体的语言实体加以描写。

自然语言为人们表达和交流精神文化(思想、感情)服务,同时语言本身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产物和组成部分。

举个包含中国文化特征的例子。假设月下老人婚姻簿上注册的只是某男某女;胡乱红绳一系,便成夫妻,“不管你皇亲国戚,不管你铜墙铁壁”。这倒省心。可是凡人找对象却远不这么简单。从历时性看,从前要考虑门当户对;从共时性看,目前要考虑文化水平。而且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诚聘”的条件远非雷同。抛彩球的办法是最符合月下老人《普通婚姻学教程》,但实际上只是个特例而已。乔太守把它当作普遍原则办案,落得个“乱点鸳鸯谱”的笑柄。

所以自然语言的情况是:



本书作者正是着眼于这“中间地带”。

第二个方面是语言单位的复杂性。词根、词缀、派生词、复合词、固定词组、固定句式、隐喻手段……。它们的理据性程度大不相同。本书提出多层级符号系统,正是充分考虑了“初恋”和“黄昏恋”的不同文化含量。

请允许我离开一步来“注疏”原作。

一般说,构建一个符号系统先要给出初始符号(变项和常项),再定义由初始符号组成的符号,然后根据符号之间的“换算”(或转换)关系,确定若干公理,最后利用公理推出各条定律。

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研究基本上是沿这一路子发展过来的。二十世纪前半纪(1957年以前)是结构语言学占主流,后半纪是乔姆斯基的转换语言学占主流。在对语言结构的看法上,着重点前后是不相同的。前者强调单位符号所构成的系统(或结构),所以着重对于单位符号的辨认(identification)和范畴化(categorization);后者着眼于不同符号(列)间的转换关系。换句话说,结构语言学所理解的结构是单元符号所组成的静态结构,转换语法所理解的结构是各符号(列)互相转换的规则所组成的动态结构。相应地,前者侧重于词汇范畴(词类)的结构功能,后者侧重于句式(基本句)的转换规则。

随着对语言系统的元素和结构的认识的加深,文化与语言的关系问题随之要求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本书在这方面作了尝试:把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从词汇延伸到了词的搭配和句子(第九章和第十章)。

本书涉及其它许多方面,有些问题是作者提出来与同行专家商讨的,必将引起广泛的兴趣,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

李锡胤于黑龙江大学

2000.08.26

前 言

尽管在本世纪初就有学者注意到词义中的文化因素,但 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мпонент (文化成素) 作为术语是前苏联学者 Н. Комлев 在 1966 年正式提出并加以论证的 (见 Н. Комлев: О культурном компоненте. 载《莫斯科大学学报·语文学卷》1966 年第 5 期)。

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和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创立语言国情学,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如何揭示词语中的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民族文化语义)。在他们所著的《语言与文化》、《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等书中,对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提出了一些原则性分析手段和揭示方法。但是,他们的著作所研究的是所谓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语义”,强调了这种语义的存在。我们认为,从语言国情学本身的任务来看,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语义”是不存在的。研究表明,一种语言的民族文化语义是以另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基础上的。例如,俄语中的 сыр (乳酪), борщ (红甜菜汤), сметана (酸奶油) 等对汉族学生来说,就具有非常强的民族色彩。对汉族人来说,这些词就是民族感情色彩词 (национально

2 文化语义学

окрашенные слова),而对东欧的一些民族来说,它们就不具有民族文化特点。我们在《文化词汇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所论证的“语言是一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就是针对“民族文化语义”的。我们把词的引申义放到二级符号系统上进行考察时,就自然会涉及到该语言民族的文化背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词在一种语言中有引申义,而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引申义,或者具有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引申义的根本原因。

词的民族性首先表现在各民族都有自己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异生活、习俗和心理状况。一方面,不同的民族概括词义在相互对应的两个词所概括进去的具体内容往往因民族而异,另一方面,在第二级符号系统中,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的宗教信仰、审美观和价值观等因素。

因此,我们说,民族文化语义是相对的,受到所涉及的两种文化背景的制约。正如李锡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孤立地在一种语言中找民族文化要素,就像久入芝兰之室而要分辨芝兰之香一样困难”(见《文化词汇学》序)。

本书的目的在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上建立文化语义学分析体系,试图确立对词义中民族文化成素分析的操作规则。文化语义学作为文化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将侧重系统探讨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特点,以及受民族文化制约的非理性意义的形式化分析手段;从符号学和称名语义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因素对语义成素的影响过程;通过对比,揭示词汇的文化功能语义类别。

本书只是对文化语义学的初步探讨,理论上还很不成熟,敬请同行专家不吝赐教。

吴国华 杨喜昌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八日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 1 }
1. 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相关领域	{ 1 }
2. 语言世界与物质世界	{ 9 }
3. 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角度	{ 12 }
4. 文化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 16 }
 第二章 语言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	{ 20 }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20 }
2. 语言是认识世界的工具	{ 24 }
3. 语言的民族性	{ 27 }
4. 文化背景知识与词汇背景理论	{ 37 }

2 文化语义学

第三章 语言是一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	{ 52 }
1. 符号的本质	{ 52 }
2. 一级符号系统与二级符号系统	{ 54 }
3. 二级符号系统形成的基础	{ 61 }
第四章 词的内部形式与民族文化特点	{ 65 }
1. 关于词的理据性	{ 65 }
2. 词的理据分析	{ 69 }
第五章 语言的二级符号系统与词的非理性意义分析	{ 77 }
1. 关于语义的研究	{ 77 }
2. 义素分析与功能语义场	{ 81 }
3. 语言的二级符号系统与词的非理性意义分析	{ 96 }
4. 隐喻转义与民族文化	{ 100 }
5. 词义的历时性与模糊区域	{ 108 }
第六章 词汇文化伴随意义的跨语言对比	{ 112 }
1. 伴随意义与文化伴随意义	{ 112 }
2. 俄汉文化伴随意义之差异	{ 120 }
3. 文化同义现象与民族文化同义词	{ 123 }
第七章 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 130 }

1. 问题的提出	{ 130 }
2. 专名的指称关系及文化信息	{ 132 }
3. 专名的词汇意义	{ 135 }
4. 专名的义素分析	{ 141 }
5. 专名的多义性	{ 147 }
6. 专名的特殊使用	{ 148 }

第八章 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 153 }

1. 从文化语义学角度对动词的分类	{ 153 }
2. 动词的文化语义学价值	{ 159 }
3. 对动物名称词干动词的分析	{ 165 }

第九章 文化差异与词的搭配 { 177 }

1. 语言及其体系性	{ 177 }
2. 民族文化搭配与民族语言搭配	{ 180 }
3. 民族文化搭配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	{ 187 }
4. 民族文化搭配的类型	{ 197 }
5. 民族文化搭配形成的原因	{ 211 }
6. 民族文化搭配与外语学习	{ 216 }

第十章 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 { 226 }

1. 句子—现代语义学关注的焦点	{ 226 }
2. 句子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 228 }

4 文化语义学

3. 从文化语义学角度看句子的命题和指称	{ 237 }
4. 句子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意义	{ 241 }
5. 句子结构的文化语义学价值	{ 244 }
6. 句子的美学功能	{ 249 }

参考文献	{ 252 }
------------	---------

第一章 绪论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了。应该说,最初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是人类学家。在外语教学界,美国和前苏联的教学法家在本世纪 40 年代就明确提出,在外语教学中要对文化因素给予重视。我国最早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语言学家当首推罗常培先生,他的专著《语言与文化》早在 50 年代初就问世了。但对语言和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学科,是 6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

1. 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相关领域

1) 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 60 年代中期产生于美国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同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翻

2 文化语文学

译学、传播学、外语教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学是指:(1)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间的交际;(2)不同民族同一语言间的交际。它主要研究不同民族在跨文化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方面的问题,研究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对交际的影响及可能造成的障碍;研究交际原则、交际策略和方式等等。

6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形成时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除人类学家外,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教学法家开始对语言与文化、文化与交际作深入研究。

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跨文化交际学进入了成熟和发展时期,王福祥教授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于1972年成立,并在日本东京召开了首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研讨会;

(2)跨文化交际学成为大学的一门课程。目前,美国有200多所大学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代表性的教科书有《现代文化人类学读本》、《跨文化交际学选读》等;

(3)先后出版了该学科方面的理论著作,如霍尔(T. Hall)的《超越文化》、约瑟夫(F. Yousef)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

(4)跨文化交际学推动了外语教学改革。他们认为,在同外国人际交往中,语言和语法错误可以理解,而对交际上的错误则难以容

忍。^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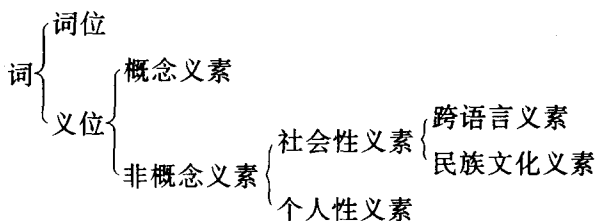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跨文化交际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学法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开展了对语言与文化关系方面问题的探讨。1995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五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该届会议上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学学会,胡文仲教授任会长。

我国语言学界、外语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近年来明显加强了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尤其对文化与交际、对跨文化交际中的种种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专著和论文陆续问世,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的科研成果。但不容否认的是,目前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比较零碎,正如胡文仲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手材料数量不大,且缺乏系统性”。为此,他建议“在协同作战、适当分工和国内同行合作的基础上,先搜集第一手材料,后作综合研究,不然很容易流于泛论。”(胡文仲,1992)

2)随着语言的宏观研究不断深入,以及联系文化学习语言命题的确立,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前苏联诞生了以研究词语民族文化语义为主要内容的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其核心是词汇背景理论(详见第二章第四节),即:

① 参见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研社,1996年,第431-432页。

4 文化语义学



如,汉语词“红”的概念义素为“血液的颜色”,而非概念义素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相关联:红旗、红眼、红尘(指人世间。有趣的是,俄语在此义上用 белый“白”一词)、红心、红包、红榜等等。根据非概念义素的不同性质可划分为社会性的、跨语言性的和民族文化性的。

按照语言国情学理论,词包括词位和义位两方面的内容。义位由概念义素和非概念义素构成,其中非概念义素又称背景义素,其总和为词汇背景。可见,语言国情学对义素的理解超出了传统语义学对义素的理解。它把通过联想试验获得的与某词有关的(有逻辑联系的)并能反映该语言民族文化特点的非概念义素也归入了义素的范围。

如果说在美国兴起的跨文化交际学主要研究交际方法、交际途径的预测和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际时可能发生的障碍的话,那么语言国情学则更侧重于研究和揭示存在于语言单位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模式。尽管两者在研究范围和任务上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是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都是建立在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载蓄功能基础之上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所

不同的是,语言国情学研究的目的是更侧重于外语教学。因此,有的学者直截了当地说,语言国情学是社会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反映。

语言国情学最初是在原苏联对外俄语教学中产生的,不排除有政治方面的色彩,即向学习俄语的外国人传授苏联的生活方式和苏联的所谓新文化。尽管如此,其研究方法和视角无疑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我国国内一些学者建议将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译为“文化背景学”或“文化语言学”或“语言文化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该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一种复杂的性质。

进入 90 年代以来,俄语中先后出现了几个意义基本相似但形式不同的术语,形成了与原有的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共存的局面。众所周知,自 70 年代起,由于受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和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连续四版的《语言与文化》(莫斯科,1973,1976,1983,1990)和《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莫斯科,1980)两本著作的影响,前苏联语言学界基本上采用了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一术语。90 年版的《苏联百科词典》中也收了这一词条。1991 年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特别是第四届语言国情学国际研讨会(1994 年 1 月 31 日-2 月 4 日,莫斯科)以来,先后出现了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等术语,就连普希金俄语学院(以下称“普院”)的“Сектор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也易名为“Отдел 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я в обучении РКИ”。据我们了解,易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和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有传播苏联文化和苏维埃生活方式的政治色彩。然而,在一些学者论著和国际俄语教师